

拜登税改计划欲重塑美国竞争新优势

文/肖宇

拜登在临近执政100天之际，即4月28日，宣布了高达1.8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计划”，加上3月31日宣布的“美国就业计划”，两项计划合计支出总金额超过了4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3月11日已经签署的1.9万亿美元《2021年美国救助计划》，那么拜登在执政初期设定的刺激计划的总金额将达到6万亿美元。要将如此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付诸实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筹集资金。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统计显示，2020财年赤字高达3.1万亿美元，而2021财年上半年（2020年10月~2021年3月）赤字已达1.7万亿美元。

与新冠疫情救助计划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增加预算赤字不同，后两项计划所需要的资金主要通过加税来获取。其中，“美国就业计划”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对跨国公司增税，“美国家庭计划”则主要是对富人增税。4月28日，拜登在国会联席会议上首次发言时强调，“现在是美国企业和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支付公平份额的时候了。”

“美国就业计划”增税指向跨国公司

自罗斯福时代以来，美国两党的政策倾向差异很大。民主党

执政时期，倾向于加税和增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而共和党则恰恰相反，总是采取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底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企业税从35%降到21%。特朗普崇拜的共和党总统是里根，因而他在税收政策上也用上了里根时期供给学派的理论，认为减税可以刺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但特朗普的政策没有缓解美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美国选民求变的希望愈加凸显。而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其上台以来推出的刺激计划及相关的增税政策则具有很明显的民主党传统。

拜登提出“美国就业计划”后，财政部于4月7日公布了相配套的“美国制造税收计划”。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将公司税率提高至28%；二，对公司账面收入征收最低税；三，提高公司国外利润的税率；四，取消对国外衍生的无形资产收入（FDII）的扣减；五，取消对化石燃料的税收补贴。

首先，单就提高公司税率这一项，这意味着推翻了2017年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按照白宫的估算，公司税改革将在未来15年产生2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估算则

认为，所增加税收的70%将由最富有的美国人支付，提高公司税相当于给富人增加约1.5万亿美元的新税。为了确保大公司承担更多的税负，拜登将对收入在20亿美元或以上的大公司征收15%的账面收入最低税率。通常，美国公司每年都要上报两项收入指标：账面收入和应纳税收入。虽然两者都是衡量收入的指标，但它们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并针对不同的受众。账面收入遵循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旨在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有关公司业绩的信息。应纳税收入则由《美国国内税法》（IRC）设定，旨在确定公司的纳税义务。

其次，拜登还提议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征收21%的全球最低税率，同时敦促其他发达国家配合，以此消除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税收立法中的国际漏洞。一旦拜登的提案在美国国会通过，并且美国同意欧洲提出的对美国在欧洲的数字公司征税计划，那么美欧合力就会改变全球税收格局。有美国学者甚至表示，21%的全球最低税率很可能意味着“避税天堂的死亡”。沃顿商学院的研究发现，拜登的税收计划中21%的全球最低税率和其他国际条款如果能够付诸实施，从2022年到2031年，

将能筹集资金9870亿美元，几乎是拜登公司税改革计划总额的一半。

再次，通过取消对国外衍生的无形资产收入（FDII）的扣减来增加税收。国外衍生的无形资产收入的扣减，主要是针对美国公司的无形资产，比如大量的专利和版权出口收入，以及向位于美国境外的人提供的服务。美国公司被要求在总收入中包含FDII，但随即就可以扣减。在特朗普2017年税法通过之后，2018~2025年间的扣除率为37.5%。在拜登提出新的税改方案时，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1%，因而FDII的有效税率其实只有13.125%。拜登政府认为，这部分扣除并没有起到激励美国公司在国内的投资，反而推动美国

企业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沃顿商学院的报告显示，取消这部分扣除，未来十年可以为联邦政府增加2600亿美元税收。

最后，取消对矿物燃料的补贴，预计总额超过35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报告强调，这部分损失主要由油气公司而非消费者承担，并且也不会影响能源安全。

“美国家庭计划”增税指向富人

而4月28日公布的高达1.8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计划”，主要是对儿童、学生及家庭进行补贴。按照拜登政府的设想，该计划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通过通过对富人增税。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拜登计划将收入超过

100万美元的个人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提高到39.6%。目前，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在出售持有年以上的股票和债券等资产、获得长期资本收益时，是按照20%的税率进行征税。奥巴马时期为支持《可负担医疗法案》，针对富人加征了3.8%的投资收入税。因而，当前富人的投资收益需要缴纳23.8%的税。如果拜登的提案获得国会批准，那么富人就需要为其投资收益缴纳43.4%的税（39.6%+3.8%），这一税率将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在个别高税收的州，如纽约、加州等，富人的资本收益所缴纳的税将超过50%。美国国税局2018年报告显示，约0.3%的美国纳税人报告调整后的总收入超过100万美元。根据拜登的计划，40万美元年收入以下的人士不用缴纳投资收入税，因而中产阶级将能够较大幅度降低投资成本。

其次，拜登还要求国会取消对私募股权基金经理“附带权益”的优惠税收待遇。所谓“附带权益”，通俗点说就是“业绩提成”，通常为基金投资利润的20%，因而美国基金经理年收入通常高达数百万美元。据行业组织美国投资委员会称，自1913年以来，美国税法一直将“附带权益”视为资本收益，因而美国基金经理只需缴纳23.8%的联邦税。而一般情况下，美国普通人士为其工资需要缴纳的最高税率为37%，这样一来，许多富有的基



振兴美国中产阶级是拜登政府“美国就业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图为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四个孩子在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的公园里玩耍。

金经理实际上为其收益缴纳的税率，大大低于收入在17万美元以上的工薪家庭。

再次，拜登还计划调整继承房产税。拜登希望将房屋遗产视为出售遗产，让继承人为收到房产之前发生的收益买单。白宫在介绍这一提案时表示，单身继承人可免税的最高额度是100万美元，夫妇的免税额则高达250万美元。假设有人继承了当时以30万美元购买的现价为150万美元家庭住宅，那么根据拜登的计划，在此人获得的120万美元利润中，有20万美元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美国房屋销售中间价约为35万美元，但从2020年2月到2021年初，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房屋销售量猛增了81%。

按照《福布斯》杂志记者莎拉·汉森的归纳，拜登税改将造成不同的赢家和输家。其中，损失较大的一方包括高收入者、大型庄园的继承人、富有的投资者、对冲基金巨头、高收入房地产投资者以及逃税人员。而获益较多的包括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纳税人、有孩子的中低收入家庭、没有孩子的低收入者等。此外，鉴于美国各州聚集的富裕人口比例不同，受到拜登税收新政较大影响的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等，这些州受影响的人口占比将超过1%。

将不可避免对全球经济带来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尤其是考虑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加持，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将使得全球经济发展的预期发生极大改变。尽管目前市场机构普遍预期，由于民主党在国会中仅享有微弱优势，最终形成的税改方案还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即便方案出现调整，美国政府疫后刺激经济及配套措施的相关举措，势必会对未来数年的全球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美国政府对待制造业态度的变化，会推动全球价值链进入重构动荡期。虽然传统观点认为减税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方案就是基于此原理。但若考虑本国税收减少、各国竞争性减税博弈和综合福利效应冲抵，减税对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作用还有待观察。在经历了特朗普政府直接减税的政策试错之后，拜登政府改变了这一策略，而辅之以更加精准的配套税收政策，如对“工作岗位转移到国外”的企业征收10%附加税、对“制造回流到美国”企业提供10%税收抵免，以帮助实现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部署。对比来看，无论是特朗普减税，还是拜登政府加税，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发展态度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更多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本土。美国政府这一态度转变，势必会对以

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带来巨大影响。可以说，自上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这轮全球化分工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传统中美制造业分工的“微笑曲线”也将随之发生重大调整，这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也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其次，全球通胀预期会迅速攀升。由于对美国参议院“调和程序”使用次数的限制，在顺利情况下，拜登政府在《2021年美国救助计划》之后宣布的刺激方案，最快也得等到今年10月1日之后出台。但考虑到美国参众两院对拜登政府征税存在分歧，尤其是对富人征税将直接撼动美国富人阶层利益，因此税改计划最终走向还有待观察。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全球预期的改变，从而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卷化”，这反过来又将大大提升全球通胀预期。如：为了对在此次疫情期间遭受影响的企业和个人给予支持，德国执政联盟已通过了一项总金额高达1300亿欧元的刺激方案；日本政府也已推出了总投资高达73.6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全球大规模刺激计划带来的全球需求的抬升，使得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价格同步上涨，在供需两端发力推动全球资产价格水平进入新的上升通道。^[7]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兼职研究员）